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S-18/PV.3
24 April 1990
CHINESE

大会

第十八届特别会议

UN LIBRARY

第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MAY 7 1990

UN/SA COLLECTION

1990年4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主席: 加巴先生 | | (尼日利亚) |
| 嗣后: 贾雅先生 | (副主席) | (文莱国) |
| 嗣后: 德瓦里殊夫人 | (副主席) | (哥斯达黎加) |

— 继续一般性辩论 (9) (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 | |
|-----------|-------|
| 瓦伦女士 | (瑞典) |
| 拉尔科-科克斯先生 | (秘鲁) |
| 奥布明斯基先生 | (苏联) |
| 德米凯利斯先生 | (意大利) |
| 郑拓彬先生 | (中国)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兰德里先生

(加拿大)

杜克兰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弗拉尔森先生

(挪威)

博塞尔先生

(土耳其)

戈扎里先生

(阿尔及利亚)

菲格雷多

(委内瑞拉)

上午10点10分开会

议程项目8和9(续)

一般性辩论

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A/S-18/7和Add.1(第1和第2部分))

杰尔姆·瓦伦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瑞典政府热烈欢迎纳米比亚成为联合国新的会员国。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这不仅是纳米比亚人民的胜利,也是联合国的胜利,联合国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从殖民主义向自由的和平和民主过渡。

从全球来讲,超级大国之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紧张关系缓和,东欧和中欧正处在令人鼓舞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进程之中,区域冲突出现缓解的迹象,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处于一种更加良好的气候,有利于对问题采取广泛的国际解决方法。

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将这种国际合作的有益的政治气候转化成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相同的进步。在这一方面,成果仍然有限,而且往往令人失望。

1980年代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增长缓慢或负增长的10年。在许多情况下,债务负担是恢复经济的最大障碍。贫穷和环境恶化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率是经济停滞不前和不平衡的悲惨效应。

为了给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创造恰当的条件,必须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采取措施。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其公民的生活承担责任。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往往是痛苦的步骤,以进行经济改革,使其变成比较开放的市场经济,实行现实的价格制度。另外一些国家尚未

开始这样做。

工业化国家也必须采取必要的、有时是困难的国内决定，以改善全球经济的运作，促进全体的利益。

必须更加注意人力资源发展问题。促进人权、民主和大众参与、基本教育、就业、保健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努力本身就是目标，而且这也是实现持久增长和消除广泛贫困的基本方法。

任何发展政策要获得成功还必须承认妇女在社会和生产劳动中的作用。

经验证明，任何社会在民主和多元化的政治气候下，才能最好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着环境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经济衰退和贫困。穷国和穷人被迫过度开发他们的自然资源，以满足紧迫的短期需要。但是，这样做导致环境恶化——如沙漠化、土地退化和洪水——这些问题又威胁着他们未来生存的基础。

至关重要的是，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扭转这一进程的途径。事实上，对工业化国家来说扭转这一进程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必须渗透到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政策以及活动之中。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持续发展。

发展中世界的大量资源仍然在向外转移。事实上，世界上富裕的国家是资金的纯接受者。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许多国家为战胜债务危机作出了巨大努力，实行了全面的经济调整和复兴方案。这样的方案是任何复兴的关键部分。正如各个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些方案开始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但是，大多数国家虽然作出了努力，但是它们的债务情况很少或没有得到改善。债务负担仍然极大地阻碍着长期发展的努力。

对严重负债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去年开始的加强的债务战略将具有重大意

义。现在预言这一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债务、增加资金流动,特别是来自私人贷款者的资金,还为时过早。但是,目前达成的协定确实使人看到希望。

对低收入、严重负债国所达成的措施是一项突破。现在应该明确指出,所采取的行动还不够。近年来许多国家采取了行动,在这样的合作中取得了经验,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进行减债。我将提出一些看法。

多边贷款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应继续提供大量资金,这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各方更快地利用货币基金条件优惠的结构调整贷款,这一点尤其值得推荐。

对一些低收入国家来说,一个具体的问题是偿还世界银行的债务。国际开发协会现在提供补充信贷,挪威和瑞典也增加了捐款,因而这个问题部分得到了缓解。为此目的,还应在捐助者和世界银行筹集更多的资金。

一些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多边借贷组织经费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在这些国家进行巨大的经济复兴计划并寻求国际合作时,它们必须得到支持。从这一方面看,解决拖欠经费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制定一项名为“权利”的方法。我相信,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也将采取同样的革新措施。捐助团体也应该在拖欠经费国家支持集团的基础之上进行努力。

至于双边官方债务问题,瑞典欢迎一些捐助国去年宣布取消大量的优惠性债务。瑞典在十多年前就取消了它的官方发展援助贷款。

然而,更加沉重的负担是非优惠性双边债务。1988年,低收入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一债务的数额超过其债务总数的一半以上。所谓的多伦多重新安排这一债务的条款想成为解决这一沉重负担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多伦多条款的执行确成了一个困难的进程,立即救济也有限。因此,加强解决这种债务问题的战略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集中三点:

第一,更大的优惠。重新安排债务必须是现实的。在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救济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应该加强救济。第三,长期协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许多国家而言,完全偿还债务的能力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应该解决债务遗留的问题,而不应解决偿还到期的债务问题。

最后,不仅有官方债务,还有无担保的商业债务,回购应该成为这一债务战略的一部分。因此,瑞典欢迎世界银行为此提出的新方法,并希望首次行动能够尽快进行。在这方面也需要额外的资金。

我已经强调了提供进一步债务救济的必要性。同时,显然增加发展援助也是同样需要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恢复增长,这不仅需要本国的努力,还需要以优惠的条件提供额外新的资金。

在1990年代,我们必须合作提供充分的高质量的援助,帮助贫穷国家恢复经济,实现长期发展。

因此,瑞典呼吁捐助国增加其官方发展援助,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根据现有的条约义务完全的支付分摊经费。

东欧出现了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瑞典在许多方面支持这一发展。

对东欧提供的援助绝不能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削减军费开支将能产生可用于经济和社会目的的额外资金。

国际贸易在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一个能够抵御保护主义压力的公开的多边贸易制度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可行的制度必须能够尊重现有的规则,也必须表现出足够的灵活,以扩大其领域,满足商品贸易中结构性变化所提出的新的需求。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宝贵机会。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是该《回合》取得积极结果的重要保证。

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多样性,但是我们感到它们更充分地与国际贸易制度一体化对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十分有利的。

在今后数年,关贸总协定和普遍优惠制度将特别关心最不发达国家。

对许多低收入的国家而言,商品出口仍然具有极其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在促进商品多样化的同时,稳定并增加商品出口的收入。

联合国在促进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在1990年代,我们将更加需要联合国。然而,在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作缺乏效率、工作重复,并缺乏一种主次感。对此,我们会员国是有重大责任的。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局势的严重和许多尚待解决的紧迫的任务,本组织这一不够完善的方面应该尽快得到克服。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联合国的相对优势,以期增强联合国的效率。

让我们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中解决全球公平和平衡的挑战。在这一努力中利用联合国极其独特的潜力。

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吉列尔莫·拉尔科-科克斯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讲话。

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吉列尔莫·拉尔科-科克斯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吉列尔莫·拉尔科-科克斯先生,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拉尔科-科克斯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昨天,我们看到纳米比亚共和国加入了在这里济济一堂的国际大家庭。这是该国人民为实现正义和自由的愿望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秘书长进行耐心和有效的工作的结果。秘鲁人民和政府欢呼这一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证明了本组织在实现世界和平、安全、发展和正义目标中的力量。

主席先生，我还要祝贺你当选为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主席。你广泛的经验和奉献精神使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审议工作获得成功。我还要祝贺大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和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国，筹备委员会近几个月来作出种种努力使为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对大多数人的需要有巨大的意义。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以必要的批判精神审议国际经济合作和形势最紧急的国家中恢复发展的问题具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样做是对形势作出反应，我们承认以广泛的机构变化为特点的国际现实，多极化还未得到持久的巩固，巨大的技术变化正成为人改变国际制度的因素以及生产和商业领域正得到重新定义。在不忽略国际社会早已确定的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最终目标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就发展获得协商一致的意见并且无论是国际经济的基础还是财富的分配都得重新制定确保平衡的国际经济的方法。

对80年代的形势作有回顾性的评价以使国际社会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关注。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过去的10年意味着国际经济进程边缘化进而导致经济显著恶化并且人民的社会条件也恶化。

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除了生产和消费机构发生世界性变化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继续受到大量资金净转移向北方国家、债务问题严重、保护主义措施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重新出现并得到加强、贸易条件恶化以及技术长久落后的影响。结果在社会领域，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度贫困，婴儿死亡率、营养、健康和失业都降低到20多年前的水平。

简言之这对发展来说是浪费的10年。政府进行发展的努力毫无成效，我们不否认在具体情况下采取的具体行动的价值，国际社会的行动既没有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范围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实质。战后涌现的国际经济机构已证明不能够预测或纠正今天机构上的不平衡和深刻的世界危机。

在拉丁美洲这一具体情况下，形势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在那里面临着更多的因素。对该地区至关重要的出口商品价格被压低。巨额的债务负担实际上意味着发展的倒退。利率继续居高不下，不公正的贸易惯例逐步升级使我们离开传统的市场。国际贸易的增长率不高对整个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产生一种有增无减的趋向，使资金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净转移到工业化国家。

然而，尽管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恶化造成了威胁，该地区近年来已重申民主是社会组织最先进的形式并尊重公民自由。同时工业化国家似乎忘记了危机的形势，不断提出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压力并偏爱特定经济和社会模式的建议，从而破坏了我们社会和国家的自治并且否认了它们机构建设的多样性。

当发展中国家使发展问题成为联合国一个主要关注的问题的时候，它们把行动集中在制定对世界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并使之民主化的全面方案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计划纲领和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曾在一系列国际发展战略中得到详细的阐述，它们最清楚的表达了变革国际经济关系的努力。今天概念上政治上仍有效的这些建议值得重新重视，尽管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中采用双边主义从而削弱了国际发展合作并突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担调整负担的不平衡状况。不管怎么说需要重新确定的是程序、谈判计划和条件。

我们在认识到发展努力获得成功和需要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之间的联系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以同样的紧迫感认识到有必要重新确定我们的发展模式并使其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从而有利于恢复我们的生产机构。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保证稳定持久的发展进程，这一进程连同社会正义是任何民主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同我们的人民应享有的自由的主要保证。

然而问题并不仅是接受把发展定义为完全受制于市场力量的逐步进程的公式。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在政府所起的作用下调剂必要的

市场平衡，将其置于人民主权之下，人民主权是民主精髓的唯一表达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指出少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特定情况下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功试验，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它们受到并非严格经济的因素的控制，而常常取决于被迫被选择作用的战略考虑。

因此必须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它们的责任。我们同意恢复增长寻求发展的艰巨复杂的任务落在我们身上。然而，我们同时意识到除非我们至少可以依靠工业化国家以具体的行动改善今天的国际环境的坚定的政治承诺，否则发展进程就不会获得成功。

因此，我们在本届特别会议有一个独特的机会，表明业已恢复的团结精神并避免可能产生的对抗，这种对抗可能是出于好意，但其特点仍然是对贫穷及其后果缺乏认识。这个事业的成功取决于各方的必要的政治意愿，而且特别取决于作出必要的承诺。

今天我们正看到对国际经济体系作出意义深远的调整。在政治和战略水平上，超级大国之间缓和的新时期5年以前已经开始。核战争的幽灵正逐渐消失。区域冲突开始大为减少。世界和平从未象今天这样接近事实。

同时，我们看到国际经济舞台的迅速变革，一个世界金融大国在亚洲兴起，欧洲一体化得到巩固、新的市场在本半球建立起来，而且东欧国家加入世界经济。这些巨大的变革正方兴未艾，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世界来说日趋边缘化，因此这些变革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国际行动的先决条件。这一趋势的作用和影响将取决于每一个区域和国家的具体特点。

对秘鲁来说，我们认为，我国在刚刚开始的这个10年中所起的作用将同制定一项区域、半球和全球的多边政策，扩大同拉丁美洲国家和本区域外的发展中国家一致和团结的领域，促进一体化进程的进步和巩固以及动员促进合作的能力紧密相联。

根据定义,危机既是风险也是机会。在我们今天面临的微妙的形势下,1990年代的挑战代表了另外一个返回经济增长和发展道路的机会。牺牲和要求将会很多。伟大的挑战必将是使我们的经济置身于激烈的世界技术变革之中,并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各种水平的福利和他们理所应得的进步。

世界经济体系不容置疑的相互依赖要求我们在寻求竞争力的环境中使生产结构现代化,巩固政府机构并加强社会组织。在这些条件下并在一个恰当的国际环境之中稳定和调整政策才能保护最受压抑和最易受害的社会部门,用具体的方案保护它们避免受害,并在不长的时间内获得积极的宏观经济效果。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自从在这个大会堂里就工业化社会为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一致而进行的谈判失败以来,几乎已经过去了10年。我们不愿再次看到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等到下一个千年,那么对许多国家来说已经为时太晚了。整个国际社会都应为没有采取行动和没有迎接目前情况向我们提出的历史性挑战而负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代表大会感谢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刚才所作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秘鲁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吉列尔莫·阿尔科克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主席台。

议程项目8和9(续)

一般性辩论

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A/S-18/7和Add.1)
(第一和第二部分)

奥布明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首先,我热烈祝贺纳米比亚成为联合国第160个会员国。这一事件使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其他世界问题也能够有效地加以解决。

本届特别会议召开之时，正值世界发展处于一个转折点。这好象是人类在深渊的边上恢复知觉以后努力使自己摆脱对抗的锁链，并开始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需要一个新的哲学和核心政策。冷战已经被制止。核灾难的威胁已经减少。向真正裁军和解决区域冲突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对话已经开始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形式和准则。

在全世界，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把面向军事的经济转变为和平时期的经济，从而带来和平收益。近来人们经常说，没有什么和平收益，因为它被苏联和美国的国内需求消耗掉了。但这似乎是对裁军进程评估的过于简单的方法。

当然，销毁削减的武器并把军事工业转变为民用生产，在初期阶段需要大量开支。但是，人们必须看到这些步骤为恢复各自的国家机器和整个世界经济的重大意义。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压缩通货膨胀和利率、并由此确保全世界更高的增长，减少军事开支将得到长期的和平收益。

对世界事务新的政治思维的提出已经使苏联今年将其国防预算削减了14%。美国也有减少其军事开支的真正潜力。和平收益的潜力不仅限于苏美关系。国际社会期望在欧洲削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谈判中达成协议。

国际缓和和解决区域冲突的进程也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减少军事开支，因为发展中国家军队总人数接近2000万。据估计，购买武器的费用几乎占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全部外债的25%。

苏联坚定地确保东西方政治和经济缓和在努力形成整个国际社会一体化结构的主流中得以发展，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将得到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还有权分享和平收益，这些收益是通过加强和扩大裁军进程和发展国际经济关系而产生的。

主要由于东西方对抗的结束，解决外债问题的共同方法在国际经济对话中正逐渐形成。大会的几个决议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事实上，人们都承认，按初期条件不可能偿付或收回目前的债务。部分债务现在正在被取消，其他的债务正在推迟偿还。

在1986至1989年期间，苏联采取了具体步骤，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达140亿卢布。苏联正在考虑采取另外的措施，以便减少接受苏联贷款的主要是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

尽管苏联经济面对过渡时期的巨大困难,我们继续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最高苏维埃将97亿卢布用于1990年的这种援助。这种援助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其基础是优先考虑普遍人类价值和选择自由的原则。

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关心产生于它对那些为平等、社会进步、民主和人的体面生活而奋斗的人们的坚定不移的声援立场。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苏联人民第三届特别代表大会上明确的阐述了这一点。苏联赞成发展问题,包括援助和债务问题方式的国际化。我们希望秘书长关于债务问题的特别代表克拉克西先生的活动将促成关于这一问题的协议。

在联合国系统内外运转的援助和解决债务问题多边合作机制可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准备参加这些机制。在这些机制范围内提出的建议应当符合接受国的长期国家优先项目,并考虑到改善这些国家人口情况的需要。

债务问题以及不断下跌的商品价格、利率和货币波动、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控制的,尽管这些问题造成的痛苦主要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当今现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希望以脱离其他问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信息和技术革命在为文明的发展开辟独一无二前景的同时,扩大了先进的经济大国和具有传统的工业,甚至工业化以前生产模式的许多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尤其最不发达的国家正处在它们几乎不能单独解决的深深的经济危机中。我们不应当让它们被推出世界经济的范围之外。

这一情况由于人口方面的问题而变得更加严重。据估计,世界上预计将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增加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将出生在已经有十亿以上人口并生活在贫困中的发展中地区。为了迎接人口挑战,我们必须解决错综复杂的种族、经济、文化、宗教和其他问题,如果不动调联合国系统的全部潜力,几乎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信息和技术革命为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合作创造了崭新的基础。必须让世界上最

好的科学家同心协力的发展最好的技术解决办法,把我们从生态灾难中解救出来。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技术交流专门制度,这种制度将考虑到共同利益,并按照各国的生态情况考虑到它们的具体需要。

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保证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作好有效的准备,这次会议将通过集中各种潜力、机会、资源和思想来采取一种与生态威胁进行斗争的共同战略。

信息和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促使国际市场必须获得自身内在的动力。在这方面,所有国家都要面对寻找适应新的情况、防止和克服危机办法的挑战。在这方面,保证国家和市场机会的相互补充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要有效地实现国家经济中的许多目标,可以不通过严格的中央集中制,而可以通过使用经济办法对市场机制进行管理的方式,同时保证人民得到足够的社会保障以及各种繁荣形式的平等。

在国际一级上,各国政府作出共同的、以行动为重点的努力、限制金融流动的易变性以及汇率和商品以及能源价格的不合理波动变得日益重要。协调国家宏观政策已成为一种日趋增长的趋势。

区域和多边经济和金融组织的活动似乎正日益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这将为建立合作的更广泛基础以及让所有国家集团参与这一进程开辟道路。如果不对经济主权的理论重新进行估价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应当为各自的发展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也是公认的。在过去,这种理论主要被解释为在严格自治基础上进行国家经济活动的权利。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各国应当考虑到本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并应当在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对这一政策负责。

当然,那些在国际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家对创造有利于这一经济发展的环境负有特殊责任。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应当对这一进程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其主要方式应当是保证国家经济的效率。

我们与外国的合作表明,在更合理的利用内部资源和外部贷款、促进经济活动的有效方式,以及通过公共、合作、私有以及其他部门之间的最佳相互关系使生产多样化方面还需要作很多工作。有关国际机构的专门知识和各国经验的交流将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苏联关于财产、土地和租赁关系的新法律正为我国的新经济体制奠定基础,并正促进公民的自由生产活动和各种形式的企业。一整套新的法律正在制定中,目的是为了加快改革和向有管理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我们相信,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将对后者的平衡和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从而促进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执行波恩经济论坛上通过的最后文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展特殊作用。东欧经济复苏以及建立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的全欧经济区的进展符合所有国家,当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国家包括正在建立的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42个创始国内。

在这一进程的范围内,东欧将加强它作为强大的贸易伙伴大有希望的市场以及财政资源和技术来源的潜力。当然,要利用这些机会,有关各方都应当为发展现代合作形式积极进行工作。

我们同意为保证本届特别会议有助于取得经济协商一致的广泛努力,这种协商一致将反映对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进程进行的现实估价基础之上的全球利益平衡。

在形成这种协商一致时,应当考虑下列各点。第一,必须承认,调整国家经济,使其适应世界经济进程的相互依赖性。这意味着对这种调解结果的估价不仅要从国家立场出发,而且还要从它们对别国影响的观点出发。毫无疑问,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致意见应当考虑到那些不能在没有外来支持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第二,必须协调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国家和国际因素,把它作为各国稳定和以可预见方式参与国际经济生活的基础。我们认为这种协调进程是民主和经济多元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作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项条件每个国家的经济开放性。这种经济开放性应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包括提供统计数字、进入市场和接受技术的机会、资金、货物、服务和人力的流动，以及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的方案等。

第四，通过联合国系统研究开发在社会和经济生活各具体领域里的人们普遍接受和世界各地普遍适用的国际标准、规则和准则。

第五，增强联合国系统在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整体结构方面的作用。旨在政府间交往方面实行上述标准和规则的活动无疑将促进这一进程。

此外，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的联合国为探索在世界各地合协地协调一体化进程的方式提供了最为恰当的场所。

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和仍在进行的谈判表明，我们在工作中有着牢固的基础，这就是77国集团，加拿大，欧洲和许多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我们还应当强调不结盟运动的贡献，该运动在本届特别会议期间召开其部长级会议。

所有这些使我们满怀希望的认为，到本周末我们将能够就一项协商一致文件取得一致意见，该文件不仅将反映各种利益的归纳，而且还将反映我们的共同决心，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加强经济基础，以使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安全和文明的世界秩序，并且促进更有效的利用联合国机制促进多边经济合作。

德米凯利斯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我们在纽约举行了这一次会议对我们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这个世界正在努力在2000年之前开发出一项使地球能够为所有人居住的地方的战略。有许多因素使本届会议带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在这十年结束之际我们必须回顾总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值得实现的愿望未能实现，而且世界未能拯救仍然陷于低标准或往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条件中的五分之四的人类。我们必须回顾至今所取得的进展，并找到应付新的挑战的方式和途径。

第二，在欧洲大陆仍在出现异乎寻常的变化。欧洲正在首次开始恢复被十月革命所打碎的统一，十月革命导致了分裂，而这种分裂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立的相互对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得到扩大。今天，即使在不久前还是另一个样子的东欧，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正在恢复，建立在责任心、私人首创性、冒险精神和社会团结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正在重新出现。

然而，往往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在古老的大陆上已经结束，我们不希望看到由于不发达国家而产生新的冲突。我们必须解除它们的担忧，即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对它们来说可能比过去的十年将更加糟糕。事实上，这最后十年必须是更好。但是如果认为发展的问题不需要较富裕国家的联合协助就能够得到解决，那是自欺欺人的。西方民主国家也必须承担起责任，在全球范围内作出解决那些共产主义未能在国家或国际层面上解决的这一问题。我们也同直接有关的各国一道，感到有责任解决与这一未能解决的难题一道出现的公正的问题。

此外，东欧的需求要求我们对它的复兴作出贡献，这些需求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传统来说比南方的各种问题更为熟悉，我们关心南方的问题往往不是因为考虑周到的自私，而是由于内疚。所以我们必须以行动而不是以言论来做出保证，以驱散他们的这种担心：一旦欧洲解决了自己的基本冲突，它将只关心自己的问题而忽略其他国家的问题。

第三个考虑是民主正在成为我们当代的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民主并不是欧洲特有的内在特征，而是世界各地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一项必要前提条件。东欧的事态发展表明，民主是所有发明创造中的最伟大的一项，是解除一切教条主义的有效制度。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更加警惕在每一种意识形态中所固有的种种幻想。从经济方面说，我们知道任何乌托邦方式、任何极权组织——它象极为不幸的遭到失败的模式那样，要求严格计划供应或确定需求——只能导致死胡同。

这些考虑应当成为我们的出发点，以在1980年代所吸取的教训、尤其是反

面的教训的基础上制定战略，并旨在减少——如果不是修正的话——破坏稳定的不平衡现象。下面我将仅仅概述一下三个可能的行为方式。

第一，必须加强和扩大区域合作。这一方式至今已得到试验并经受过考验，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的多数地方，包括地中海、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都是如此。区域合作可以满足短期的需求，适应具有密切联系的各国的特点及其密切关系，并防止宗教和种族的可能危机。在过去数年里，人们就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说了许多，也许说的太多。这样庞大的一个目标不可能立即实现。只能是：一步一步和一点一点的着手实现，并且必须从低点开始集中各种努力、资源和决策。

第二，我们必须应付那些能够使许多国家共同努力的种种挑战，以便使我们的共同利益成为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因素。西方经济的主流一直是清楚地看到个人和集体利益。在此也应当列入那些较为富裕的国家，以确保它们对南方各国的政策是恰当的并得到足够的协商一致的支持。

在过去3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4倍，并在2000年将达到80亿。我们早已看到穷国的人口正在大量移向富国，并在大量从南方移向北方。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正如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一现象有可能导致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在过去，一个大陆的富饶或贫瘠也曾引起过大规模的迁移。今天，人们仍在大规模的迁移，但是他们迁移人群较小以致可能几乎不会被注意。如果不加以制止获得不采取充分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已使人们固守他们的祖籍地方，这一新的不断发展的迁移浪潮很可能危险地导致新型的剥削，并产生一种没有任何决策权和权利的个人阶级，即使在较为高度发达的社会也是如此。

毒品是我们当代的另一项重大威胁。毒品本身是罪恶的，而且还反映出其他的罪恶。其产生的部分原因是世界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毒品也是富国和穷国之间不平衡的产物，它们必然带来反抗和暴力的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在有些大陆遍地都在生产这种致命的作物，这种作物可以到处移植，并在经济衰退和愿意接受它们的地方蓬勃生长。

我们必须采取步骤阻止我们这个星球的自杀性的漂移。不过富国不能把它们自己的准则强加于别人，特别是当它们无法保护它们自己的绿带时，却要求其他国家拯救亚马逊河。但是我们对生态的忧虑不应使我们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充满实用主义的狂乱的乌托邦理论中牺牲技术的进步。这种忧虑产生于认为工业社会的核心产生威胁的看法，并且正在造成一种普遍的恐惧，即维持生命的力量本身能够造成我们的死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对抗、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对抗刚刚结束，目前还没有被将统治下一个十年的新的对抗所取代，这种对抗就是工业化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对抗。

这个新战略的第三个特点产生于这种认识，即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种世界经济，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相互依赖，通过商业、经济和金融纽带联系在一起，并且信息的迅速传递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距离变得微不足道。由于这种相互依赖性，在谈判桌上就有越来越多的平等交换，优势和劣势可以更加容易地相互交换而取消。所有这些都为政治行动提供了更大的活动范围，加强了它安排或重新安排优先项目的的能力，并使它更容易解决在诸如移民和发展、或者是在负债和环境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有三大主要的不平衡为新的十年带来了阴影，必须对之加以控制。

首先，是人口的分布不平衡。人口的定时炸弹正在威胁要在一个由于人口过多而受到蹂躏的世界爆炸。一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仍然太快，这样就很难提高生活水平，尽管那里的经济增长率是令人满意的。这样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营养不良和失业正在削弱生产力；人口的压力正在导致滥用土地和使农业和环境遗产恶化，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地区正在加剧城市人口增加的问题。实行有效人口政策的国家仍然很少。适当地控制这些现象的主动行动能够有助于限制贫穷的发展，从而促进振兴经济的努力。

第二个需要克服的不平衡是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利用在其他领域中已成

功地使用过的程序、例如海洋法和空间法领域，达成一个真正的国际环境法，那么就需要对基本的原则达成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因此，最近我们在锡耶纳发起召开了一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他们的结论对将于1992年夏天在巴西举行的重要会议十分有益。

最后，就是债务问题。我们已经参与并帮助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战略作出一些改进，在为减少债务筹措资金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布雷迪计划是一个里程碑，但是该计划本身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作出更大的和更协调的努力。如果新的战略考虑到在各个债务国集团之间的分歧，就需要有更大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将多伦多首脑会议所建议的方法作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并把它扩大到其他地理区域，正如在玻利维亚所进行的那样。我们正在特殊考虑中等国家，由于它们的收入，它们无法从现在实行的减免债务方案中得到益处。对这些国家应当提出专门的解决办法。

在全国必须提出更广泛的财政刺激，这样私人银行就能够通过缓减债务行动帮助减少债务负担。还应当有直接的机制、例如将债务与环境、将债务与社会投资联系在一起的机制。也应当建议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支助能力，或者通过提高配额、或者通过批准其他的筹资机制来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

贝蒂诺·克拉克西先生根据对他个人的授权，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应当根据这份报告审议所有的问题。我们对克拉克西先生的选择表示欢迎，这也是对我国对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贡献的赞扬，这是为在两个半球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框架的必要步骤。除了其他措施之外，意大利准备取消对贫穷国家所欠的债务。

债务问题与国际贸易问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负有编辑将在今后指导我们关系的准则这一任务。必须在1990年完成谈判，确保多边主义的哲学战胜保护主义的政策，不仅是在个别国家而且在个别区域都是这样。因此，唯一的替代办法同样是普遍的逐步一体化。关贸总协定将要求在解决争

端和取得政治方面的机制的变革中加强机构。最终的目标是在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进行机构间的合作，以促进在贸易和发展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更大程度的协调一致。我们必须避免僵硬的遵守关贸总协定的技术和法律规则，确保它们服从于一个适当的国际组织范围的政治评估。我们还建议适当考虑新出现的国家的需要，对热带产品实行特许权，以及一种逐步的和灵活的关税政策。

资金的问题是发展的中心问题，但是，1970年代所得到的一个教训是，为了发展，合理利用资金与资金的数量同样重要。最理想的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利用资金，即用它来为开始自治的过程创造必要的条件，发动重要的市场经济，吸引大量的直接投资。应当由最贫穷的国家自己决定通过建立充分的政治和司法机构为建立富有成效的投资创造条件。

但是，所有这些都增加而不是减少进行政治干预的需要，因为，如果完全依赖经济力量来拉平令人震惊的以前存在的不平等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资金的净转移。从1970年代的经验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主张是，对发展提供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0.7%的捐款。这些资金必须用于具体的项目，但是，充分的分配手段也同样必不可少；为此目的必须利用区域银行，例如为东欧国家最近批准的欧洲重建和开发银行。我们认为，地中海地区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机制。

我现在来谈欧洲的作用。欧洲共同体12国已通过加紧政治一体化的日程，对加快发展的速度作出了反应。它们不仅将1992年定为建立单一市场的期限，而且将它作为通过建立金融经济联盟和进行根本机构改革促成政治联盟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的日期。12国还在准备与新从独裁国家中产生的国家谈判新形式的联合，以便在自由主动性和市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陆性的经济。

因此，欧洲正在恢复自己的中心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它所产生的财富，而且还由于它所达到的一体化的先进程度，这就成为今后的一个模式。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根据共同体的创始人所设想的宏伟计划向外部世界开放欧洲的问题。随着目前走向全球化的总的趋势，最终将没有什么外部世界可言，领土和文化只是在作为单一的全球体系的方面存在。欧洲、特别是共同体各国必须把这种新发现的中心位置转变成为对其边界之外的许多贫困地区的一种更大的承诺。

由于这一扩大的市场，欧洲共同体将很快地拥有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作出适当反映的途径和能力。它将必须利用它的某些新的资源，来促进东方的变革，并且解决地中海南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因此，我们打算建议，到1993年，12国的目标将是把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用来使东欧和地中海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获益，具体分配如下：东欧25%，地中海25%，所有其他国家50%。根据相当可靠的预测，到1993年，12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达到6万亿美元。因此，1%意味着每年转让600亿美元，包括多边和双边援助。

这是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上表达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表明我们知道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所面临的巨大的危险，以及任何按照过去的办法混日子的其它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转让12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应当首先从直接和间接的公共基金开始生效，无论是以拨款用于发展援助的形式、捐助多边机构、还是保证贷款和私人投资的其它机制。

这些资源的转让主要应当通过现有和新建立的多边渠道，比如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或通过目前正在为地中海考虑的那样的渠道。多边工具将能够更好地确保筹措资金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增长战略、财政计划以及吸收和偿还能力。这样一种措施也将使之有可能避免过去方法中存在的浪费和低效率，过去的办法只能加剧债务危机。这种措施也将允许不按照商业条件分配资源。

成功将主要取决于接受外部援助的国家的主动行动。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

有想象力和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建立必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结构，以便把国际合作转变为满足人类需求的真正发展。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些必要条件的第一项就是民主和尊重基本权利。民主有时似乎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但是，撤消民主机制来改变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尝试只会有助于加强不公正、压迫和不平等。我们正在寻求的新的平衡——比如人和环境之间的平衡——不可能自上而下强加。这种平衡要求公正的参与、协商一致意见和介入。

另外一个必要条件是避免区域冲突，区域冲突经常是霸权主义野心造成的，这些冲突造成了军备不断流入那些本来应当有不同优先项目的国家。过去，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造成了持久的、痛苦的和不利冲突。但是，世界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改变。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任何对手可以期待苏联自然地站在它那一边，或者反过来，因此，大会必须呼吁大幅度削减国防预算，就象参加维也纳漫长谈判的那些国家显然已经取得某种成功所寻求的那样。

这个新的十年也将是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些通过民主选择指导人类命运的国家将担负更大的责任。我们今天的行动，即使在有限的环境方面，也将对还没有出生的后代造成影响。

同每一个过渡时期一样，变革带来了普遍疮疤的危险，带来了两个半球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的危险，这将比以往的情况更有破坏性。一场生态灾难的疮疤将使人类大多数的生活条件变得不可容忍，这可能证明是比有如阴影一样笼罩了我们四十年的核战争的危险还要严重的真正灾难。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不能把许多国家留在后面而不管，否则将产生不稳定的危险，最终将毁灭我们大家。

这就意味着今后需要坚强的领导——特别是在超越国家的水平上，这也意味着联合国相应地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的会议将产生一种更强大的意愿，来共同指导未来，我要望以这一充满希望的基调来结束我的发言。

郑拓彬先生（中国）：主席先生，在七十七国集团的倡议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十年来首次讨论全球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

发展的特别联大终于召开了。人类刚刚跨入本世纪最后十年，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此时刻举行这样一次特别联大，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希望，在您富有经验的指导下，在各国代表团的通力合作下，本届会议能够取得圆满的结果，对九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祝贺和欢迎纳米比亚加入联合国和参加本届特别联大。我们相信，经过长期英勇斗争赢得独立的纳米比亚人民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际社会在九十年代面临一系列重大课题。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是其中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

回顾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严重的不平衡。南北差距继续扩大。纠正南北之间的不平衡，缩小南北差距，并帮助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应是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但令人遗憾的是，过去的十年中南北对话停滞不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决策过程中进一步“边缘化”。

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有增无减，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领域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和双边安排趋势加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继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负担依然沉重，资金匮乏。战后第一次出现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倒流的现象。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受到种种阻碍。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连年下降。长期的贫困使它们陷入经济不发达和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由外部强加的所谓“调整方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起了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重后果。发达国家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往往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使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更不稳定。

八十年代的发展进程已经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揭示：这一切的根源主要在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不改革这样一个旧的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就难以奏效，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世界经济的持久繁荣与稳定也无从谈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今天更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国际社会不能够再次丧失时机。现在需要的是有远见，是平等的合作，是切实的行动。在这方面，本届特别联大应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在九十年代发起一轮新的有实质意义的南北对话，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达成新的共识。

我们认为，下面的原则可以构成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新的共识的基础：

第一，必须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式，归根结底必须符合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顺应本国人民的意愿并且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的主动精神，同时也要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发展负有首要责任。任何人都无权对别国的发展道路和政策指手划脚。企图把某种发展模式作为万应灵药到处推广，强加于人，这不仅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作法。

当前，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一种有害无益的倾向，少数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干涉他国内政。这不仅妨碍国与国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会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威胁。

第二、必须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不能有根本的好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经济环境能不能有明显的改善，取决于国际社会能不能有效地支持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主要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相互之间的政策，必须充分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国际协调应该有各国的公平参与，不能由一家或者几家说了算。对主要发达国家采取的可能产生重大外部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适当的国际监督。

在建立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方面，联合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有所作为。

第三、应该把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目标。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不解决世界五分之四

人口的发展问题，全球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都是难以实现的。国际社会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积极探讨解决的办法。因此，本届特别联大把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重点，是完全必要和适宜的。

本着上述各项原则，当前迫切需要在相互关联的一些领域采取有效的措施，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这些措施应包括：

——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减轻偿债负担。债务问题的解决应以恢复和促进债务国的发展为前提。

——迅速扭转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倒流。国际形势新的变化不应影响对发展中国家业已十分有限的资金流入。

——制止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发达国家要认真履行关于制止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消除针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商品共同基金已经生效，应努力使其尽早开始运营。

——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并大力开发它们的人力资源。

——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考虑，提供新的资金，加速有关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保护能力，并且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充分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需要。

——为最不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其它处于不利地理条件或者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特别的帮助，包括制订一项九十年代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动纲领。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是九十年代国际议事日程上的一个举世关注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希望，本届特别联大将充分体现合作精神，通过一个具有远见的和面向行动的最后文件，为上述这些活动提供明确的指导，为九十年代的国际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愿借此机会简要地谈一谈中国的发展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作了长期的、积极的探索。历史告诉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使中华民族摆脱贫困、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道路。中国人民经过四十年，尤其是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国政府正在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即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奋斗。

中国的改革旨在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起来的体制，使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广泛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积极吸收外国的资金，借鉴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包括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

实行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翻了一番，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四倍，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现代化建设第一阶段的目标已提前实现。事实证明，我们迄今所执行的基本政策符合中国的国情，是正确的，是得到中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的，因而也是不会改变的。

目前，我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调整某些具体政策，解决过去一段时期存在的经济过热和某些宏观失控、秩序混乱的问题。这绝不是改革、开放的收缩，而是要为更好地改革开放创造必要条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顺利地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下一个十年再翻一番的战略目标。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所以，我们采取切实措施，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稳定；继续执行一系列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推动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事实将进一步雄辩地证明，一个独立自主的、稳定的、富强的中国将会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兰德里夫人（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召开本届特别会议的时间是非常恰当的，它将有助于奠定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战略的基础。它还是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刻召开的。

因此，我们兴高采烈地欢迎纳米比亚作为联合国第160个会员国加入我们的行列，第一次参加大会以及这一重要的努力。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八十年代是极为困难的十年。因此，我们怀着希望以及避免过去的错误的坚定愿望对90年代满怀期望。我们作为各自国家的代表，应当借此机会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和为导致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健全的国家政策奠定基础的方法。

当我们走进二十世纪最后这个十年时，我们的世界正变得更加相互依存。我们都承担着创造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的责任。加拿大对这种合作与大会特别会议的重视，反映在加拿大提出的概括很多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设想的文件之中。

很多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政策是应当加以重申的。首先，全体人类都享有免受饥饿贫穷、无知、疾病和恐惧的基本生活权利。第二，各国都对其经济发展政策及其公民的福利政策负责任。第三，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行有效的发展政策，最后，有效的多边机构能够也应当用来改进经济合作。

我愿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谈到三个主要题目，这些题目与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革紧密相连。

（以法语发言）

第一个题目就是经济多元化。我们都意识到，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公民和企业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使它们能够从事他们认为最有益于自己和社区的经济活动。我们还需要对更具有竞争性的世界环境作出反应，而这样做的时候，也要调整我们的经济。

增长需要具有广泛的基础，吸引人民大众参与经济生产活动。改善生活条件、扩大平等以及人民广泛参加经济，需要一个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的体制环境。

减少各国社会中的贫困现象必须成为主要的目标。

经济增长要求各国制订持续的宏观经济结构，并积极地推行长期的国内经济改革。它们应当强调更大的经济灵活性和反应性，有效地使用资金和人力资源，为竞争、创新和私有企业提供更广阔的活动范围。

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在传递信息中的作用。这种信号对很多不同的活动和政府政策是十分关键的。它们对有效地动员金融部门的国内储蓄以及对使农民能够决定种植何种作物以使其农田的收益达到最大限度都是十分关键的。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是最有效的方法，利用这个方法，我们才能够安排我们的经济，以最好地满足我们公民的需要和愿望。

如果要使大多数人能够有效的参与多样化的经济，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发挥他们的潜力，就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人类需要：必须使文盲有机会学习读写，特别是为穷人提供适当的职业培训；有病的人或者缺少食物的人应该能够获得初级卫生保健和基本营养；儿童需要疾病免疫，母亲需要接受有关如何照料婴儿和年龄稍大孩子的教育；妇女应该有机会接受教育，这样她们才可以完全参加她们生活所及的范围的发展，这样，她们才可以获得贷款和其它提高她们挣得收入能力所需要的条件；发展的成果必须平等地分享。

我们特别关注环境保护问题。这是全球面临的挑战，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其公民有能力和技术以正确和持久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环境进行生产。应该优先注意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农业和林业地区的重建和保护。不采取这样的治理性行动就不可能改善他们的福利。

与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多样化，基本的论点是如果人民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就会增进我们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国家一级或地方一级，个人必须有机会参与与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决策。现在有效行使这些权利部分依赖于恰当的民主机制和这些机制的有效性。

应该允许城市和农村居民选举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对设置有关公共设施、教育、保健、水供应和其他基础设施服务拥有决策权。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东欧出现了新的民主政府。我们知道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在重建民主政府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其它情况下，由于自由选举，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体制，以便使人民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

最后，应该使司法管理独立，公共管理公正，前后一致，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都关心腐化问题，因为它能对国家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腐化除了对决策机器造成损失和破坏以外，还破坏人民对国家机构的信心。政府机构和公共行政当局必须最终对人民负责，满足他们的需要。

许多年来，由各不同少数民族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分享自然资源和其它资源方面的困难而引起的区域冲突由于超级大国的竞争而加剧了。区域冲突中的代理人往往体现出这种竞争所造成的困难。区域和国际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了许多冲突，给贫民百姓造成了难以描述的痛苦，他们有些人不得不抛弃家园，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聚集在拥挤的难民营里。

我特别关注非洲之角的局势，那里几百万的人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由于外部干预而愈演愈烈的内战发展到了不仅严重破坏地方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地步，而且还给向冲突地区运输食品造成了威胁，这些地区的人民已经遭受着旱灾，今天又面临饥饿的威胁。

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政治紧张和军事竞争方面的环节对解决区域冲突产生了巨大动力，可以提供一个机会，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机会。

发展和重新获得增长依靠我们将重点放在使经济和社会多样化发展的恰当的国内政策和方案上。这还依靠体制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和能力的改善，以便使人民有机会进行投资，成为企业家并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加拿大认为通过国际合作和有效的多边机构可以最好地实现加拿大的根本利益和所有国家的利益。我们决心让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希望这次特别大会带来更富建设性的对话，抛弃过去徒劳无功的辩论。

我们都对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负有责任：国际社会应该继续提供必要的外部资源，以促进结构改革并帮助贫困者和弱者减轻有害的后果。应该向执行旨在增长的改革的国家提供支持，帮助它们管理（必要的话减少）它们的外债负担。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可信赖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这一体系能够有效地促进增长和发展。随着很大程度的市场自由化，乌拉圭回合的成功将有利于所有国家。

加拿大决心继续向许多国家提供大规模的扩大的援助方案，决心继续发展多边机构。我们仍然致力于帮助各国利用结构调整所创造的机会，促进平等的经济复兴。加拿大继续支持发挥人力资源潜力的努力，特别是多样化社会的人力资源。

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将在这次特别大会上以及在今后的十年中共同努力，以确保我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杜克兰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十分高兴地和其他会员国一起对独立的纳米比亚共和国加入国际大家庭感到十分的欣慰。多年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团多年来与作为纳米比亚人民有能力的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我国的官员也十分荣幸地参与了过度时期援助团的工作。援助团在推动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着在今后的岁月中，我国代表团和政府与贵国代表团和政府进行更加密切地合作，努力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

联合国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向国际社会各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摆脱1980年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痛苦经历，并决心重新制定1990年代的发展战略，直接解决议程上的问题，使国际合作与南方各国的增长与发展之间建立起更有意义的关系。

在明天的世界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不仅意味着要改变“发展”的观念,而且同样意味着必须具有巨大的政治意愿来克服障碍,促进建立真正支持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内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将要求有一个辅助性的有效性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基础。发展的责任必须由各国共同承担。

从通常的方法来讲,发展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它以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来测定发展的程度。这种方法最终导致产生了一种高人一等的发展形式。并且从加勒比较小的岛国经济来看,这种测定也是明显不足的。它并没有反映出人民发展的真正水平,也没有涉及经济建设的成本和利润。

使人民登上发展进程的中心舞台也许是必须对发展这一概念作出的唯一最重要的观念上的改变。就业、生活质量和机会的创造等其他目标也必须给予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给发展重新下定义并把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愿望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些和其他一些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必须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技术差距不断扩大,这比我们早就认识到的外汇差距和储蓄—投资差距更为重要。在今后几年,在其它领域获得的发展成果可能轻易地被技术上的变化所侵蚀,因为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力量较弱的国家正面临着边缘化的真正前景。促进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需要作出适当的反应,这一反应必须是全面的和实际的,必须坚决向技术流动提供资金提出建议。

向南方恢复转让技术的需要也是为克服全球性环境危机而起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继续认为持续发展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结构的变化将更加符合现在和未来的需要。

有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1992年会议将解决这些问题,但本届特别会议必须表现出世界各国具有一种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恢复实行所有国家的长期发展方法的政治意愿,这一可行的基础将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短期得到解决。环境危机又给发展中岛国的特殊困难增添了新的因素。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保护主义和非官税贸易壁垒又重新抬头,而此时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它们又被要求向国际竞争开放市场。由于非官税贸易壁垒比过去更大地影响到了世界贸易,多边贸易制度必须与一种多边主义和合需要的贸易数量限制的新趋势展开竞争。

多边贸易的现有规则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市场的获得、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必须加以紧迫地改善。这对象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岛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我国国内市场较小,难以从大规模经济中受益,这样就必须出口大量的商品和劳务。因此,应该继续进行推动贸易自由化的集体努力,平均获得市场这一根本原则必须受到全面的尊重。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实现最广泛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最佳机制,而《乌拉圭回合》的成功将大大增进全球性的经济繁荣。主要贸易实体一体化的增强不应削弱多边的贸易制度,两者应该相互协调,以自己的组织形式增进国际贸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市场机会。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曾经表示,在当前一轮多边谈判中,必须首先解决遗留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但是,出现的总趋势并不是这样。迄今为止,《乌拉圭回合》谈判较少地注意到对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的市场获得的问题,而更多地注意到了起草劳务和知识产权这些领域的新规则。一大批提案,尤其是为多边贸易制度带来新的歧视机制的保障制度方面的提案也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乌拉圭回合》的最后阶段应该密切注意发展议程的关键问题,国家不论大小,它们的贡献都必须得到承认,因为《乌拉圭回合》的结果是所有贸易国家所关心的问题。

80年代初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实际利率的大幅度增加促发了无论数量还是持续时间都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当时采用了结构调整方案来在短期内平衡发展中国家对外和外内的账户,同时打下长期发展的基础。这样做导致“调整疲劳”现象的出现,因为以社会公平来改变生产结构依然是新的发展范例的中心原则。

由于各国现在认识到解决债务问题是债权国和债务国两方面的责任,所以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步骤。为解决低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召开的七国集团多伦多最高级会议同意有必要在巴黎俱乐部中更加宽容地安排低收入国家债务的偿还期。法国和日本随后采取了行动集中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美国的建议,即布雷迪计划,明确指出了债务、贸易和增长之间的联系。

这些行动之所以值得鼓舞是因为它们承认了在有效解决债务危机中减少债务的必要。然而减少债务必需包括更大范围的国家和各种债务。国际债务战略还应当包括那些为了履行国际金融义务而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国家。

这方面加拿大政府最近决定通过取消官方援助债务来向加勒比联邦国家提供财政豁免,这应当看作是具体性的贡献。

多边借贷机构提供的国际收支援助必需同经济增长过程联系起来。提出经济复苏恢复增长的具体建议时需要重新评价并考虑这些项目中资金转移碰到的实现、保障范围和缺少优惠性资金来源。

东欧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提出了90年代的利息挑战和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应当根据本届特别会议的目标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保证世界资金流量的平衡和确保公平的发展。

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应当加速裁军的进程并有利于把资金从军事工业转向社会生产行业,包括发展合作。这个和平的成果应当减少全球军事开支每年一万亿美元的一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应用来达到各国持续发展的目标。

世界现在正处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正发生导致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深刻变化。这一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应当不断加以评价,以便使发展中国家获

得机会经历新的增长和发展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确定了南方国家国内经济管理和国际支持需要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互补性，国际支持包括贸易和发展可预料的全球经济环境。国际社会必需以各国得到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继续建立这一基础。

联合国所处的位置适合于鼓舞和协调这一集体的努力。进行中的工作，比如阐明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奎回合的最后阶段以及筹备1992年环境和发展会议都应当得益于本届特别会议发出的明确的政治信号。现在我们必须充分汇合多方的政治意愿，确定为恢复南方国家的增长和发展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准则。

弗拉尔森先生(挪威):首先我愿分享前几位发言者的喜悦,欢迎独立、民主、多数统治的纳米比亚作为本组织第160个成员国。我国代表团当然期待着同纳米比亚代表团共事。

自从大会决定召开本届特别会议以来约15个月中,世界和国际关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范围广泛并具有特色,现在的确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去为全球经济合作打下新的政治基础,并且给予联合国和其他全球经济论坛中的经济对话新的推动力。

东欧和中欧发生了非常广泛迅速的民主化和改革浪潮。伴随政治变革的是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变革,不过这种经济改革旨在加强动员人力和自然资源。根据已表明的心愿,经济变革还旨在使东欧国家更多地加入世界经济的主流,这可望使其得到很受欢迎的帮助。

每个民族有权通过其自由选出的代表管理自己的根本原则近来已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了许多成功。特别是纳米比亚上个月获得了独立并实施了多数统治,以及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新发展。*

* 副主席杰亚先生(文莱国)发言

今年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在解决几个区域性冲突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这有助于提高本组织的地位和威望。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和大为改善其关系有助于大幅度改善普遍的政治气候。这也应该有助于经济对话。许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对利用本组织在诸如努力保护环境、同滥用毒品作斗争和促进经济一体化等处于政治议程优先地位的领域取得实际成果重新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对于联合国的高度期望和庞大的要求必须伴之以加强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本组织的支持。

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已经在许多领域几乎消失，或者至少大为缩小。经济辩论也是如此。面向市场的做法越来越依赖于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同时，没有人能够认真地反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还必须有一个充分和有效的公营部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确保希望从进程中得到的好处免受垄断和滥用统治地位的威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分配收入并提供社会安全制度。

在发展中国家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表示了温和和务实的态度。例如，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上届不结盟首脑会议的宣言中并且在筹备本届特别会议所提出的建议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态度。似乎没有人反对，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发展负有重要责任，同时已经有人在置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努力如要成功就必须有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负有共同的责任，确保世界经济提供一个帮助而不是阻碍我们国家努力的基础。

趋于更大程度意见一致的积极的政治变革和趋势意味着我们现在有一个形成一项新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宝贵机会，这个协商一致意见将为提高和改善国际合作提供政治基础，以帮助我们在正是本千年末我们所看到的种种挑战并且最大可能地利用新形势所提供的各种机会。

这个协商一致意见必须列入本届特别会议的一项宣言之中，它应该是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既对专家有意义，又能够打动全世界有关人士的心。通过筹备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对一项总的方法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意见，其中包括筹化主要的挑战并对如何迎接挑战制订广泛的方针，而不是制订解决具体问题

题的方法。这项工作无论如何必须由各种主管机构完成并且必须不断地加以改进和改善。

这项宣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在政治上推动和指导各主管机构作出更加具体的努力。事实上并不缺乏机会使普遍原则和方针更加具体。9月份将召开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巴黎会议；今年秋天大会将最后确定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年底前将要完成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明年夏天的第八届贸发会议；以及1992年环境和发展会议，这只是列举了一些最接近和最重要的机会。

谈到这项宣言的正式文本，我想就其应该有的内容提出一些看法。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其内容的结构应该围绕着三个广泛的领域或者支柱助。

第一个支柱应该是经济，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一方面承认各国经济的迅速国际化如何使我们更加相互依赖，因此相互的成功对我们何等重要，失败则使我们互相受到伤害；另一方面，诸如资源流动和债务等有关问题如何同其他问题，特别是贸易和产品进入市场等问题紧密相联。事实是，只有以统一的方式并在广泛的战线上解决主要问题，才能够取得决定性进步。

在经济领域的优先任务应该是：

第一，实现更加有助于在广泛基础上恢复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恢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全球经济基础；

第二，改善产品进入市场情况并加强多边贸易系统；在这方面要使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圆满成功并使双方均能获益；

第三，继续改善和调整国际债务战略并酌情辅之以进一步的措施，以便尽早解决外债问题；

第四，扭转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净额转移的局面，在这方面作出坚决的努力，实现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即0.7%的目标和0.15%的目标用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加强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决不能牺牲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第五,继续调整我们各自的国内政策,以便建立有利于持续增长的国家经济环境。

第二个支柱应当是人的发展。我们所有努力的最终目标是我们人民的幸福。与此同时,人的发展也是实现持久和公平增长和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手段。只有通过改进调动促进发展的人力资源的方法才有可能根除继续存在的普遍贫困。要使长期经济和社会增长与发展成为可能,就必须有健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他们还应当享有人权和公民权,并能够充分参与本国的经济和政治进程。任何成功的发展政策都必须充分认识到妇女--其人数占人力资源库的一半--应当发挥的作用。我们为保证儿童的教育、健康和幸福所能做的一切也是对未来的重大投资。如果其他发展努力要获得成功,成功的人口政策是先决条件。

第三个支柱应当是人的活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个人的、企业的和社团的、国家的和国际的--都必须建立在持续发展概念的基础上。随着军事威胁的消失和减少,生态威胁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已成为许多人,尤其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严重关注。幸运的是,政治和军事紧张局势的减少为我们对付当代的真正挑战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当代世界大部分地方的发展危机和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生态危机是两个最重大的挑战。

对大部分全球性污染和资源减少负责的发达国家还应当承担寻找能够逆转目前无法持续趋势的解决办法的主要责任。解决环境问题将要求调动大量的新的和更多的资源。所有国家和所有国际组织都必须审查它们的活动,确保这些活动符合持续的原则。任何不顾及对大自然影响的行动迟早将被证明会产生反效果。

因此,《宣言》应当讨论如何更好地管理全球经济、如何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照顾我们所生活的地球的问题。

为了补充和加强个人和国家的努力,我们还需要增加和提高国际合作。为了这种合作,也许需要有一些新的工具,但基本上我们已拥有我们需要的组织。从广义上来说,联合国系统是我们现有的唯一真正的普遍论坛,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讨论任

何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联合国将促进多边合作。如果我们要比过去更好地利用这独一无二的工具,认识到更多的共同利益并更多地强调实用主义和实际结果,这将取决于我们这些会员国政府。

让下面这段话成为本届特别会议的主要信息:庄严保证加强和改进国际合作,尤其要重新推动联合国系统范围内的全球经济对话。

博泽尔先生(土耳其)(以法语发言):首先,对能够向大会发言我表示高兴。我相信,在加巴先生的主持下,我们将能够成功地完成旨在为全人类的幸福促进国际合作的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看到纳米比亚经过多年的艰难困苦,终于在国际大家庭中占居合法席位表示高兴。

本届特别会议是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开始时召开的。因此,这使我们能够审查世界经济的发展,并强调1990年代我们将面临的挑战。在现有国际机构正受到深刻变革的影响时,这当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重大变革的时期。一方面,东欧正发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表明,东西方之间的思想意识分歧正逐渐缩小。另一方面,区域化运动--这种运动在太平洋两岸正变得日益明显--、欧洲共同体的努力以及欧洲完全一体化的前景都表明目前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结构调整进程。

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以及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给改革和希望的这一图景蒙上了阴影。

面对如此之多的变化和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种现实主义方式,既避免骄傲自满,又避免危言耸听。换言之,我们有义务依靠能够充分反映当代国际经济现实的国际合作新形式。这些现实包括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生态上的相互依赖、对市场经济日益增加的依赖、经济结构和问题的多样性,以及建立以互利为基础的关系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增长和发展的前景似乎主要以下列三个因素为基础:它们自己将采取的政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经济体系坚持执行发展中国家有效政策的能力。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经验已经证实了国内政策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采取外向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更为充分的享受到外贸、外国投资和相对充分的贷款机会所带来的好处。

土耳其在这方面的经验是个很好的例子。自1980年以来,土耳其在—项有效的结构调整方案内,从根本上改革了它的经济结构和它同世界经济的关系。结果,在过去十年里,取得了重要的经济增长率和飞速的工业变革。出口增长了五倍,工业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一倍多,达80%,同时国际收支平衡也大有改进,过去二年出现盈余。因此,土耳其能够定期和准时地履行其偿债义务,从而减少了其外债。

诚然,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有利条件来实施外向政策。对于严重负债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进程在1980年代要慢得多,以至它们在世界增长的指标中远远落后。

一般来说,尤于其相对的份量和增长潜力,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世界经济结构中已出现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出现日益不均衡的现象。事实上,在过去七年中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国家从整体上说取得了虽然不大但却是持续的增长,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仍然在经历—场深刻的危机。

尽管存在着这一日益增长的不对称现象,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他们的合作程度影响到发展中国的政策。工业化国家中负责经济政策的人们之间加强了他们的合作,其意义已反映在最近几年中。但是,仍有着遥远的路要走。失业、保护主义措施、高额实际利率、外部失衡、对换率的剧烈波动以及金融市场的脆弱性等普遍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处理这些问题要求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和结构政策方面建立这种合作,并适当的考虑到发展中国的利益和需求。

这一合作本身并不足以世界的更好未来创造条件。进行—合作的同时,

还应当以国际贸易和金融制度的稳定来加以补充。但是，国家政策往往似乎与国际经济制度的根本基础毫不相容。而且国际贸易制度正在日益受到保护主义扩张的威胁，这种保护主义是在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协定)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单方面或双边协议的形式下进行的。各国政府所宣布的长期目标及其他追求的短期政策之间显然正在出现明显的分歧。因此我们应当明确的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压力，并谴责破坏国际贸易机制的措施。在这方面，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是一次良好的机会。这一谈判的成功将加强多边贸易制度，这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所特别关心的问题作出充分和具体的响应来加以实现。这一态度还有助于表明，经济一体化的方向是旨在统一和解放各内部市场并使之充满活力，而不是建立不利于第三国家的新的壁垒。

在重新建立多边贸易制度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当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国际资金方面进行更为有效的合作。奇怪的是，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代却是将资金净转让给工业化国家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利息率的提高，这些使许多发展国家的债务危机更为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当承认最近在减少债务及其偿还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然而，持久的解决办法要求人们采取进一步的努力，并采取一系列不仅完全反映金融考虑而且考虑反映有关贸易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考虑的措施。

有效的合作不仅应当反映于贸易和资金流动方面，而且应当涉及如原材料技术转让、环境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应当由我们找到共同利益的领域。

超越严格的经济考虑和利益的唯一问题是同赤贫的斗争。事实上，由于政治和人道主义两方面的原因，对这一瘟疫再也不能予以容忍。整个国际社会有义务尽可能地满足最不发达国家中数百万人的健康、营养、教育和就业方面的起码需求。

南南合作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这种合作得到直接有关各国的支持和工业化国家的鼓励的话。它还应从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中受益。在这方

面，我强调土耳其现在完全能够扩大它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反映于以下事实：发展中国家在土耳其外贸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增加，土耳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努力的支持在不断增加。

某些东欧国家中的改革运动也为对话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要以面向市场经济和多元化民主的政策来取代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教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这种行动还可能导致短期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困难。因此，国际社会必需继续竭尽可能地支持这一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复杂和艰巨的努力。

土耳其坚决地赞成多元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观念，它对东欧发生的变革表示衷心的欢迎。土耳其以这种精神积极地参与了志旨在支持这些国家的所有的国际倡议。土耳其在二十四国集团中，在积极为一些东欧国家提供援助和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是这种承诺的具体的例子。土耳其还希望与这些国家分享在议会民主制度内结构调整比例中的经验。尽管如此，我们也意识到向东欧提供的支持不应当转移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注意力和资金。对我们来说，“国际制度”也代表了“合作制度”。这种合作要想十分有效就必须反应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政治意愿。重要的一点是在正在发生深刻的和迅速变革的时刻调动这种意愿。

最近在波恩召开的会议对东西方的经济关系寄予了新的动力。现在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取得同样的成就的时刻。因此我们希望我们将在本届大会结束时通过的宣言以今后的进展为目的的注重行动的审议的鼓舞。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对正在进行的第四个国际发展战略的工作作出贡献。这种贡献更加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发展战略应当是以对世界经济采取一种全球性的和平衡的概念、以现实主义的灵活方法为基础。

因此，我们不应低估可能破坏争取更加具有功能和多样化国际合作这一努力所面临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表现出共同的克服困难的决心，这些困难是不能够阻挠我们的。

在结束讲话时，我希望这次会议将会获得成功并取得具体的成果。

戈扎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对尼日利亚的加巴先生当选为第十八届特别大会主席表示祝贺。在第四十四届大会上,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他的智慧和能力,这是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保证,这是一次促进联合国声望的会议。这种声望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纳米比亚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获得了独立。这是在欢迎纳米比亚加入独立国家行列时我们所提到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历史时刻,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要对我们的纳米比亚朋友表达它的高兴和兄弟般的情谊。的确,纳米比亚加入联合国是人民争取独立获得成功的一个新的例子。•

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在联合国组织内铭记这种新的动力和帮助促进国际合作所进行的不懈的努力应当得到我们的钦佩和支持。我要在此为他作出的值得赞扬的努力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大会召开一次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振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特别大会时,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它使我们能够重新估量最近出现的进展。它也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合作与国际政治中的数量变化相互作用。

实际上,今天国际政治气候的改善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正在扩大。此外,这种改善强调了现在存在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它清楚地表明国际经济合作不应当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它应当与政治领域中的区域国际合作同时进行。最后,二十世纪的事件已经表明存在有许多挑战,而且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建立持久的和平和安全。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国际局势和国际经济合作,我们可以看到继续发挥影响的趋势,我们怎么能够不注意到发达国家多年来持续增长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停滞、甚至是经济衰退之间的明显的矛盾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解释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负值资金净转移呢?在1984--1989年期间这一转移相当于1800亿美元,而仅在1989年1年就超过了510亿美元。

• 卡斯罗德达理施夫人(副主席)在主席台上就座。

在贸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扩大并且在1989年已经增加到超过3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日益增加的边缘化呢?

我们怎么能够对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男男女女的数目视而不见呢?他们的数目已经超过十亿,而且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

难道能够继续忽略发展中国家由于果敢地执行结构调整方案而必须付出的社会和政治代价吗?结果仅仅是看到这些努力到头来一无所成,这是由于对它们根本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危险所造成的原料价格的波动。

实际上,这些国家当中的大多数继续受到削弱,这是由于偿还债务出口收入的下降,造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原材料价格和商品价格下降的双重现象,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继续存在,这就使它们最有活力的部门的产品不能进入这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技术转让的限制,与此同时,它们面临外部资金来源的减少以及官方发展援助的停滞。

非洲的经济情况仍然是严峻的,今年标志着执行《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结束,我们不得不指出,国际社会还没有履行在1986年5月份举行的关于非洲危急经济情况的大会第十三届特别会议上所作出的承诺。

如果我们考虑以合作促进发展为题举行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份表示机会和没有履行承诺的很长的单子。在1970年代,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动力以及在1974年举行的研究原材料和发展问题的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所发起的南北对话很快就面对着发达国家缺乏政治意愿。1980年9月份的第11届特别会议以及后来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所作出努力都不能够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远的共同命运的愿望,而这一直是全球谈判倡议的目标。

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没有产生成果,甚至连1980年代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新的实质性行动纲领也仍然是一项没有履行的承诺,因为在那十年里,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从三十一个增加到四十二个,对这此国家的发展援助仅仅达到捐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0.9%,而原先的目标则是0.15%。

因此,1980年代被正确地称为丧失的发展十年。在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十年的时候,本届会议必须坚定地面对未来,以便发扬过去的成就,在思想和行动的水平上巩固积极的趋势,并且努力保证目前为争取全人类进步的发展能够在新的团结和真正相互的基础上得以继续。

指出这一点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实质、它们的经济容易受到以动荡和不稳定为标志的国际气氛中不可预料的变化影响,以及趋于长期维持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制度的性质,所有这些都造成南北问题具有一种不可能缩小为思想意识焦点的规模,而我们的北方伙伴总是经常选择这样看待问题。

因此,我们极为重视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这是本届会议的主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国家起草了一项现实和平衡的纲领,该纲领在198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最高阶层得以通过。该纲领的主要内容载于77国集团向本届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所提交的宣言草案中。

我们这些国家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单独和集体自力更生。然而,尽管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明确地对自己发展承担责任,但是仍然有些主要问题需要在国际水平上得到一致的解决。其中最为重要的显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危机。除了承认必须制定一项国际债务战略,为债务国家创造一种新的增长动力之外,最近又接受了减少偿还债务的原则。这些事态发展被看作是鼓午人心的迹象,表明了接受债务国家和债权国家之间共同责任的原则。鉴于执行该战略的死气沉沉的情况以及它所附加的条件和限制,紧迫需要采取新的和更果断的措施,来满足债务国家的合法愿望。

一方面,我们必需扩大大幅度和及时减少偿还债务原则的效力,巩固其作用并增加其效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建北方国家资金流向南方国家,以此作为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途径。更为基本的是,在目前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关系中所存在的持续和恶化的动荡和没有秩序的气氛中,不可能找到持久解决发展中国家外债危机的办法。

因此,急需适当考虑债务问题、货币和金融问题以及国际合作的问题。

对环境面临的严重威胁的普遍认识是世界相互依存这一现实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因为环境问题确实是全球性的,并且不分国界。臭氧层萎缩、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散发、沙漠化、有毒废料堆积、地球的生态多样化所面临的威胁,所有这些现象引起所有国家的关注,因为这些现象威胁到现代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后代的生存。

在为应付环境挑战所采取的联合国际行动中,以及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对侵害环境应负的主要责任应充分反映出来,环境保护不应该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的道路上设置进一步的障碍。这首先需要调动新的资金并转让符合环境保护的技术。保护环境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同沙漠化作斗争,并采取真正的行动以消除贫困,因为贫困本身是对世界良知的挑战并且是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当市场全球化,通讯系统中取得的重大发展、科技发展和与保护环境有关的各种挑战使我们更加意识到各国越来越相互依存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国际合作政策,以便使之成为发展的真正工具。为达到这一目地应充分利用新的国际气氛所提供的机会。

这正是重申裁军和发展之间联系的时间和场所,这种联系应特别反映在把裁军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并努力建立适当的机制以实现这一目标。

在重大的重新组合的时候,南南合作作为国际合作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更有必要。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做到能够应付速迅变化的世界所提出的各项挑战,在集体自力更生和为经济一体化进行次区域和区域重新组合方面取得进展是一个先决条件。

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系统对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支持必须大大加强。因此,各项业务活动必须能够处理合作的次区域和区域方面的问题。这一活动应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好处,因为发展中国家认为,联合国系统的资金和经验能够在其发展进程的某个阶段提供有益的投入。这些活动应该更加坚定地集中在稳定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个体水平和相互合作水平上的内在的能力上。

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渴望确保每一个人享有充分的权利,正在北方和南方进行的经济重新组合所产生的影响,东欧国家纳入世界经济,所有这一

切要求进行适应性更强和更有力的国际合作,以便促进更加平衡的南北关系和发挥发展中世界真正潜力的南南经济领域。即将进行的制定一项新的联合国发展战略的筹备工作,1990年9月举行第二届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联合国会议,已进入最后阶段的乌拉圭回合谈判,1992年国际环境和发展会议是振兴国际合作的重要机会,本届特别会议必须为此奠定基础 and 确定参考依据。

尽管目前10年在缓和与安全的希望中开始,但消除欠发达、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共同斗争应该是这个10年的主要特征。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仅符合南方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北方各国人民的利益。联合国是向国际合作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的理想的论坛,这样没有一个人将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被抛弃的地位,它的繁荣和进步得到关心,归根结底,持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条件将继续存在。

菲格雷多·普兰卡特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怀着国际经济合作必须适应国际舞台上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信念来到这里,毫无疑问,最重大的变化是东西方缓和,这给有效和更加稳定地恢复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会。同时,如果我们想要使努力获得成功,新的行动机制必须把经济和社会发展视为给予发展中国家集体和单独的自力更生以及它们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综合与协调的进程。

我们的努力必须以团结为基础。极端的民族主义经常妨碍实现国际社会的全球性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对补充区域和次区域一级所作的努力是极其重要的。

一体化作为促进尤其是贸易和投资部门经济相互作用的一个机制是结合政治和技术利益的关键因素。它将加强东西方缓和进程的生命力,并肯定会防止冲突可能转移到南方地区。

生产和贸易、投资和金融、增长和发展以及环境、适当重视社会问题和贩卖毒品等等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应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整体,以便一一加以解决,不能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以至对全盘评估这些现象加以限制。

我们各自国家经济中的调整尽管可能是必要的，但不应由于主要工业化国家采取的政策而变得更加激烈。这些政策常常忽视了自由贸易的规则，而同样是这些国家则尤其是在决定我们经济政策的论坛上经常提到这些规则。机械地调整旨在实现在发达国家获得成功的宏观经济平衡的政策，常常不能在发展中国家取得同样结果。我们这些国家中的调整政策应符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特点。否则，我们会忽视考虑正义与社会平等。

由于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成为最终非常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的势态发展的被动的旁观者。我们不得不站在远处看着对我们的增长和发展进程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得到解决，而这种解决方式却没有考虑到会对人类大多数所产生的严重影响。似乎我们被考虑的唯一目的，就是强调我们这些国家将过现已文明的“滴流”效应而受益于由那些在国际统一行动中极具影响的国家一致建立的政治秩序。

我们必须扭转这一趋势，我们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建于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十五国集团将在几星期内举行其第一次首脑会议。该集团的存在和旨在使政治对话和分析系统化的行动，应当在两三个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领域促成最高一级的政治对话。委内瑞拉极为重视这一倡议。

我现在就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谈几个具体的问题。应当懂得，中心问题并不象有些人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可能是是否约定的各项义务将能够得到履行的问题。正常人都想摆脱依法达成的承诺。问题仍然是那种不利的条件。而有人企图用这种条件迫使我们履行这种义务。而这种强制行动则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增长与发展造成影响。

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流通，使我们能够在各自的经济中以至少与历史情况相同的速度恢复积极的生长。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个不利的倾向——我们的国内储蓄未能用于发展而是用到最不需要的地方。在拉丁美洲，向工业化国家的资金净转移在1982年——1989年间达到2000多亿美元。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资金外流不

仅是不公正和可耻的，而且象人所共知的那样严重阻碍了我们这些国家的发展。

国际贸易体制应本着开放和外向形发展战略运行，这些战略将使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增加其出口。同样，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国家由于其传统出口贸易条件恶化而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扭转这一趋势，并利用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这样的多边机构来在这方面达成谅解。我们必须回到《商品综合方案》的最初基础，避免我们成功地建立的各种具体的商品协议的恶化。这些协议在无任何稳定价格的因素的情况下，仅变成了信息工具。共同基金生效这一令人喜悦的事态发展，遇到了各种障碍，它们妨碍有效履行其之所以成立的职能。

我们开始清楚地看到的90年代的一个重要特点，似乎是强大经济集团，尤其是工业化国家间的集团的巩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统一进程，会由于使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参加进来而得到补充。美国和加拿大决心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在太平洋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强大经济集团正在扩大。

必须避免这样一种情况：这种集团的形成会威胁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对很多国家来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的和有效的秩序的机会。该回合的结果必须在所谓新领域中取得的成果与我们可能在成为南方国家根本的更传统的领域中所达成的一致观点之间保持平衡。

同样，我们希望该回合的结束以及将在1991年6月召开第8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能够当作一次机会来重新估价有关国际贸易的各项体制安排，并争取——何乐而不为？——建立一个单一的贸易组织，该组织的成员更具普遍性，其责任更加完整，其职能更加有效，实际上这一点已在40多年前的哈瓦那会议上就得到考虑。

发展的一个关键领域即科学和技术领域，必须占据加强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的真正努力的首要地位。如果没有象欧洲根据尤里卡和欧洲核研究组织提出的那种具有一定规模和意义的项目的话，我们这些国家的集体发展的战略则会产生部分影响，自然不会使我们这些地区能够应付真正的挑战。我们这些国家在技术上的高度依赖性，以及人类少数国家与多数国家之间技术不平等的加深，必须使我们确立一种新的平衡。

在这一方面,应该把保护自然资源作为国家优先任务之一,对此我们的科学家和技术研究应对此作出了反应。发达国家肯定会认为提供技术和经济资源,包括自由获取已有的科学资料和新的非污染技术,附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我们看到东西方缓和所带来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如果我们决心对这个已经变得很小的世界开始建设性进程,我们可以为我们各国人民的幸福作出另人惊人的成就。

下午1时30分散会。